



2016 年届会

2015 年 7 月 24 日至 2016 年 7 月 27 日

议程项目 5(c)

高级别部分：发展合作论坛

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与进展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发展合作论坛第五次两年期高级别会议将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和 22 日在纽约举行，在会议举行之前，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61/16 号和第 68/1 号决议的规定提交本报告，供论坛审议。报告是在两年期筹备工作的基础上编制的。第一节介绍了报告及其发展合作概念框架，其中涵盖资金、能力建设、技术开发和转让、政策变化和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第二节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角度阐述了发展合作资金流动的近期趋势；特别注意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针对性和更好地分配这种援助；使发展合作与南南合作的迅速发展协调一致。第三节讨论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范畴内需要为发展合作进行哪些调整，以及有效的发展合作对落实这些目标意味着什么。第四节述及从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不同层面对在《2030 年议程》下作出的发展承诺进行的监测、审查和问责所发挥的相辅相成的独特作用。第五节重点介绍了主要建议和结论。



一. 引言

1. 发展合作论坛为开展关于发展合作问题的包容各方的循证政策对话提供了全面的空间。论坛侧重于知识共享和相互学习,以便实现更好的可持续发展成果,促进发展政策的协调一致以及不同行为体和不同活动的协调一致。论坛汇聚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和专家、议员、民间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地方当局、慈善组织和私营部门代表。¹ 论坛对所有会员国开放,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核心职能,而该理事会在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²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采取后续行动和进行审查方面发挥全球一级的重要作用。³

2. 发展合作论坛 2016 年高级别会议将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和 22 日举行,本报告是在这次会议的两年期筹备工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其中将分析工作与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以及在大韩民国(2015 年 4 月 8 日至 10 日)、乌干达(2015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和比利时(2016 年 4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的高级别筹备专题讨论会结合起来。⁴ 2014-2016 年论坛周期的目标是:(a) 探讨发展合作如何能够应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挑战,重点放在处境特殊的国家上;(b) 审查与日益复杂的发展合作局面有关的挑战和机遇,包括官方发展援助不断变化的作用,以及使各行为体和所有现有执行手段与《2030 年议程》一致的必要性;(c) 推动发展合作南方伙伴间的政策对话;(d) 就各级对发展合作承诺的监测、审查和问责提供进一步指导。

3. 在筹备进程中提出的总主题是,发展合作的重要性和巨大潜力。从广义上讲,发展合作是有效执行《2030 年议程》的手段。

二. 近期趋势

4. 《2030 年议程》与《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和《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为发展合作提供了全面的框架。在发展合作论坛 2014-2016 年周期开始时开展了范围界定工作,并确定了发展合作的工作定义,即它是一种旨在明确支持国家或国际发展优先事项的活

¹ 大会第 61/16 号决议决定设立发展合作论坛。

²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³ 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

⁴ 针对本报告开展的研究工作是通过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的一系列政策简报进行的,这些简报可查阅 www.un.org/ecosoc/sites/www.un.org.ecosoc/files/files/en/DCF/policy-brief-dcf-2016.pdf。本报告还参考了各发展倡议开展的独立研究和分析(见第 2、13 和 15 号简报)。专题讨论会摘要可查阅以下网址:大韩民国:www.un.org/en/ecosoc/newfunct/pdf15/DCFrok_summary.pdf。乌干达:www.un.org/en/ecosoc/newfunct/pdf15/DCFuganda_official_summary.pdf。比利时:www.un.org/ecosoc/sites/www.un.org.ecosoc/files/files/en/DCF/DCFbelgium-hls-summary.pdf。

动，并非主要由利润驱动，优待发展中国家，基于力求加强发展中国家自主权的合作关系。这一定义并非用于衡量的目的，而是作为一个概念框架帮助制定各种参数，用于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范畴内的发展合作的目的、特点和种类。⁵

5. 从这一角度来看，发展合作需要采取以下几个方式的广泛国际行动：资金、能力建设、技术开发和转让、政策变化(比如确保国内政策协调一致，帮助解决全球系统性问题)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⁶ 鉴于执行《2030 年议程》所需的支持规模巨大，范围也很广，所有这些要素都将至关重要。虽然重视数额空前的所需财政资源是适当的做法，⁷ 但可持续发展目标也进一步突出强调非资金形式的发展合作的重要性。本报告中的这一节审视了用于发展合作的资金的近期趋势、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针对性以及使这一合作与南南合作的趋势和进展一致等问题。

A. 发展合作资金流动的趋势

6. 官方发展援助仍然是发展合作的独特而重要的驱动力。这种援助是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机会有限的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是唯一的国际公共融资形式，其明确目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福利，⁸ 这使其有别于可能以其他因素(比如提供国的出口业绩)为动机的其他国际公共融资形式。⁹

7. 虽然发展合作为推动和支持执行工作提供多种手段，但没有任何做法可以替代履行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作出的现有承诺。¹⁰ 为了使发展伙伴实现或超过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包括为最不发达国家制定的目标，最近的一份政策简报¹¹ 强调必须获得国内纳税人和全体选民的支持，领导人必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发展合作在国家进程中的定位必须制度化。¹²

⁵ José Antonio Alonso 和 Jonathan Glennie,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 号政策简报，“何为发展合作？”。在本报告中对这一定义作了修改，以便包括并非主要由利润驱动的活动。

⁶ 见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首份报告，“《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监测承诺和行动”(2016 年)，第二章 C 节和第二章 G 节。

⁷ 见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可查阅：www.un.org/esa/ffd/documents/ICESDF.pdf。

⁸ 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见 www.oecd.org/dac/stats/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definitionandcoverage.htm。

⁹ 见 Tim Strawson 和其他作者，发展合作论坛第 2 号政策简报，“改善官方发展援助分配以造福 2015 年后世界”(2016 年)。

¹⁰ 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10、51 和 52 段；第 70/1 号决议，第 60-71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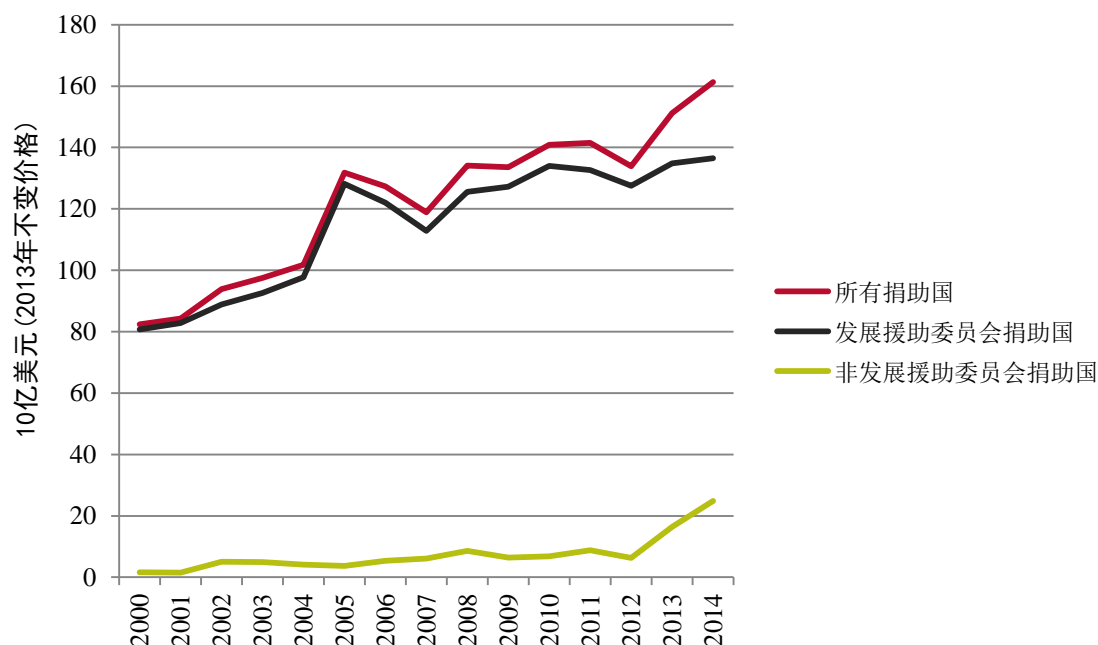
¹¹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2 号政策简报，“恢复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活力，调整发展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¹² 例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确保国家承诺实现官方发展援助目标而实行的立法改革。见 www.gov.uk/government/news/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target-bill-2015-receives-royal-assent。

8. 自 2000 年以来,官方发展援助按实际价值计算增加了 83%,¹³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近年却往往停滞不前(见图一)。¹⁴ 2014 年,用于非紧急情况的官方发展援助有所下降,原因是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引发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捐助国内部难民费用日益增加(见图二)。虽然 2015 年的部分数据显示,用于非紧急情况的官方发展援助保持稳定,但必须密切监测捐助国内部难民费用不断增加对可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潜在影响。¹⁵ 只要确保加强发展合作与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的联系,以及促进复原力建设方面的系统性投资,就会开始在新的更和谐的协调关系中提供国际支助。¹⁶

图一

2000-2014 年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趋势



资料来源: 发展倡议, 基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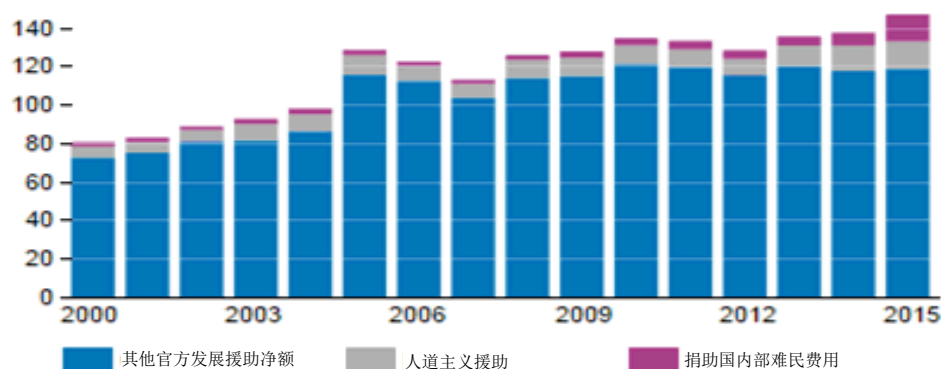
¹³ 见 www.oecd.org/dac/stats/ODA-2015-detailed-summary.pdf。

¹⁴ 下列发展伙伴不是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匈牙利、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耳他、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中国台湾省、泰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其中大部分国家在 2000 年开始提出报告。

¹⁵ 见秘书长发言人关于拟削减发展援助的声明, 2015 年 11 月 11 日。

¹⁶ 另见人道主义筹资问题高级别小组提交秘书长的报告, “十分重要, 不能失败: 处理人道主义资金缺口”(2016 年 1 月), 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和 24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举行之前印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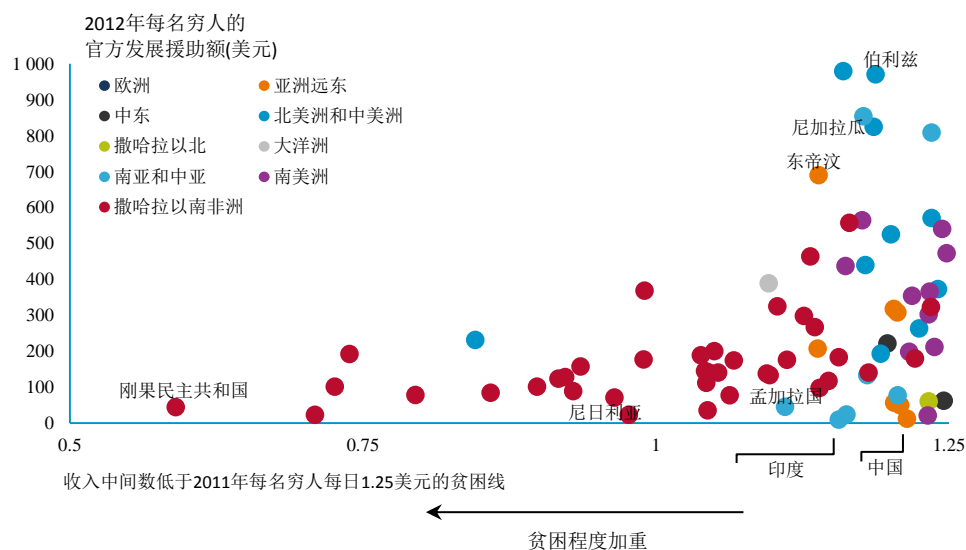
图二
2000–2015 所增加紧急援助在官方发展援助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基于经合组织发援会数据的发展倡议。

9. 在发展中国家用于投入可持续发展的现有资源组合总额中，官方发展援助仅占很小的比例。2014 年，国内公共资源(5.3 万亿美元)¹⁷ 大大超过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1 600 亿美元)，¹⁸ 综合来看，是截至目前数额最大的现有资源；然而，近期研究表明，在贫困程度最深的国家，国内公共资源往往最少(见图三)。

图三
贫困程度较低的国家每名穷人的官方发展援助额较高



资料来源：发展倡议，报告，《2015 年投资消除贫穷》。

¹⁷ 定义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到的非赠款收入总额。资料来源：发展倡议，报告，《2015 年投资消除贫穷》。

¹⁸ 基于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的发展倡议。

10. 关于主要以支持国家或国际发展为目的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并涉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源的私营实体(比如慈善基金会、企业慈善事业)的活动,没有任何官方估计数。¹⁹ 这是一个广泛趋势的一部分,这个趋势就是,一些私营部门行为体正在调整其商业模式,使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一致。据保守估计,2011年这种私人发展合作资金流动达到 450 亿美元,²⁰ 相当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为同一年提供的所有官方发展援助的三分之一。

11. 与私营实体的资金流动相结合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额虽然较小,但很重要,估计数额约为 200 亿美元或更多。²¹ 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混合办法”是否会调动更多的私人资本流动,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或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影响。²²

12. 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统计,²³ 经过几年的下滑趋势后,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于 2015 年达到 250 亿美元,与 2014 年相比增加了 4%。同一消息来源指出,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提供的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 2015 年为 398 亿美元,与 2014 年相比增加了 3%,同时预测,2016 年至 2019 年,为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额将有所下降。

13. 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自 2010 年以来有所下降,2014 年超过 40 亿美元,鉴于这些国家的结构脆弱性,这种状况需要特别关注和密切监测。²⁴ 在为受冲突或脆弱性影响的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方面,没有任何国际公认的目标,这种官方发展援助近年来一直相对停滞,按实际价值计算,自 2006 年以来每年大约为 500 亿美元。²⁵

14. 2013 年至 2014 年,在官方发展援助付款额部门模式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债务减免和一般预算援助减少,其原因均在于少数几个捐助国对那些部门的付款发

¹⁹ 见 Matthew Martin,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7 号政策简报,“私营和混合式发展合作:评估其效果和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关于《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相关规定,另见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报告(见脚注 7),特别是第 54、55、67 和 68 页。

²⁰ 发展倡议,报告,《2015 年投资消除贫穷》。

²¹ 见 Martin,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7 号政策简报(见脚注 20)。简要审议了混合式发展合作,《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将这种合作界定为公共筹资同非优惠私人资金相结合的做法,这种结合可通过 ([方式进行: 赠款、贷款或股本投入与私人资本流动相结合; 采用担保等方法,通过分担或减轻风险鼓励私人资本流动。简报还审议了公共和私人来源的“非营利性”发展合作资金流动相结合的办法。

²² 例如,见 Griffith 等 et al., 2014,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post-2015: Improv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rivate Finance, 受欧洲议会委托编写。

²³ 见 www.oecd.org/dac/stats/ODA-2015-detailed-summary.pdf。

²⁴ 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

²⁵ 同上。

生重大变化。²⁶ 最近的趋势是摆脱基于方案的办法，包括预算援助，需要密切监测这一趋势，以确保它不会破坏在提高发展合作的实效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见第三节)。

15. 虽然针对全球挑战提供了一些官方发展援助，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显然需要有这种针对性，但至关重要的是要更好地界定哪些因素构成一项全球挑战，以及有关挑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官方发展援助。经合组织目前正在使官方发展援助措施现代化，并且正在制定一个反映更广泛的资金流动情况的补充框架(见方框 1)。

方框 1：官方可持续发展支助总量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在牵头制定一个名为“官方可持续发展支助总量”的新的统计框架，以补充其衡量官方发展援助的工作。该框架将包括以下特征：

- **覆盖面：**从官方来源和行动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组织的所有资源流入，包括公共和私人资源，而不论是哪种工具
- **范围：**作为官方可持续发展支助总量列报的任何支出都必须以支持《2030 年议程》所界定的可持续发展为动机
- **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以及国际承诺和纪律保持一致
- **透明度：**反映提供国和受援国的观点(项目层面的信息和跨界流动)，监测与官方发展援助有关的框架流量。

根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55 段，该框架下的讨论应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很多其他重大问题仍有待处理。^a 尚未决定是否将官方调动的私人资本流动包括在内，这需要进一步分析，以商定一个适当办法，用于衡量公共资金对其他对可持续发展有影响的资源产生的杠杆效应。需要确定提供国和受援国的观点如何在框架内相互作用，如何相互调和。一般而言，框架不会提供对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利的激励措施——例如，鼓励短期、可能突然逆转的私人资金流动；制造过多债务；或可能通过更多以外币计值的负债增加汇率风险，这一点很重要。^b

^a 见发展政策委员会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2016 年报告(即将印发)。

^b 见 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tossd.htm。

²⁶ 同上。

B. 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针对性，使合作协调一致

16. 在《2030年议程》背景下，可以而且应该进一步确定官方发展援助的优先次序，以推动公共和私人资源投向需求最大、能力最弱的地方。²⁷

17. 一个可能提高官方发展援助针对性的办法是，规定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机构的法定授权之一是根据减贫目标有针对性地拨款。分析显示，如果捐助机构的法定任务是消除贫穷或者捐助机构认为消除贫穷是一项主要目标，则更有可能将官方发展援助分配给政府资源占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比例最低且贫困程度最高的国家。²⁸

18. 必须给予特别关注，以确保官方发展援助惠及最贫穷人口以及有具体关切问题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女童(见方框 2)。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范畴内，需要重新审议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基础的分配标准，同时考虑到国家的现有能力以及其他社会和环境脆弱性因素。²⁹

方框 2. 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开展变革性筹资

虽然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期间，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对性别平等的支助增加了两倍多，^a 但是总体投资仍远远低于实现性别平等所需的水平，而且只有小部分投资解决了妇女的具体需要。正如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所呼吁的那样，《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承诺采取和加强合理的政策和可强制执行的立法，采取和加强变革行动，以促进性别平等，在各级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还强调需要性别平等主流化，包括在制订和执行所有金融、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行动和投资，敦促各国跟踪和报告用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资源分配情况。

^a 见“从承诺到行动：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筹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性别平等网络(GENDERNET)，2015年3月，www.oecd.org/dac/gender-development/From%20commitment%20to%20action%20FINAL.pdf。

19. 在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国家的同时，还应该使方法更有针对性。目前，官方发展援助赠款拨款主要侧重于政府收入低和贫困程度高的国家，而官方发展援助贷款的分配主要侧重于政府收入低的国家，对贫困程度的强调较少。但是，大量官方发展援助赠款流向贫困水平较低的中等收入国家，主要用于资助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如减缓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³⁰

²⁷ 见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52 段。

²⁸ 见 Strawson,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2 号政策简报(见脚注 10)。

²⁹ 见大会第 67/221 号决议，其中邀请各发展伙伴考虑采用最不发达国家指标、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力资产指数和经济脆弱程度指数，作为其分配官方发展援助的部分标准(第 23 段)。

³⁰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3 号政策简报，“最不发达国家和脆弱情况下发展合作中的官方发展援助分配和其他趋势”。

20.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范畴内，人们也期待更战略性地利用发展合作，将其作为调动其他类型资源的促进因素。³¹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密切监测和记录有关证据，了解将官方发展援助用作杠杆工具的各种办法的效力，其中包括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公私伙伴关系促进私人投资。本节提及了把官方发展援助用作杠杆工具的三种方式。

21. 首先，发展合作，包括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应该在激发科学、技术和创新(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变革力量方面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以推动获得环境友好型技术，加快人类进步，建设知识社会，缩小技术差距。在努力实现上述目标期间，应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并与新设立的技术推动机制的努力和拟议的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相配合。还应重点关注如何通过发展合作利用土著/本地知识体系和技术。政策咨询和能力支持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支持各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体作出充分知情的决定，以确保稀缺的财政和非财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³²

22. 第二，在亚的斯亚贝巴税收倡议³³ 的背景下，发展合作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促进作用的支持，加强税务管理能力，并根据不同国情，通过各种方式(官方发展援助、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来采取必要措施。在有些情况下，分享技术和创新以及为加强金融体系开展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已证明是有效的。需要更透明地报告为调动国内资源进行的发展合作资金流动，以推动更加注重成果，为分享关于行之有效办法的知识提供基础。发展合作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和区域两级实现更大程度的协调一致和政策变化，有针对性地解决影响国内资源调动的系统性问题。

23. 第三，支持统计能力建设的官方发展援助仅集中在少数国家，2014 年按实际价值计算的援助下降近一半(见图四)。在实现包括目标 17 在内的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数据发挥核心作用。发展合作应特别注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能够获得数据的人和无法获得数据的人之间在数据上存在的较大差距和不平等，因为，在实现包括目标 17 在内的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数据发挥核心作用。³⁴ 该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分配应优先考虑提高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的明确战略。重点应放在政府收入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最低的国家，同时政府致力于随时间推移增加对统计机构的供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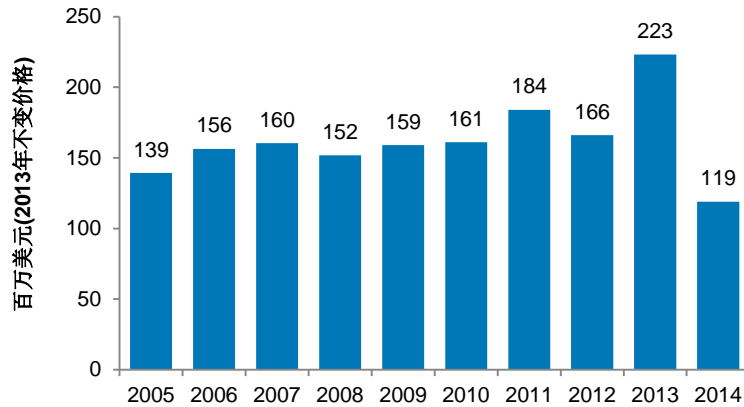
³¹ 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54 段。

³² 见 Ambuj Sagar,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5 号政策简报，“2015 年后加强技术推动和能力建设：了解问题”，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8 号政策简报，“为落实《2030 年议程》开展促进技术便利化和能力建设的国际发展合作”。

³³ 见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22 段，及 A/70/320，第 56 和 57 段。

³⁴ 例如，见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125-129 段，及第 70/1 号决议，第 48 段。

图四
支持统计能力建设的官方发展援助



资料来源：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

C. 南南合作的趋势和发展

24. 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放缓，商品价格下降，南南合作继续增长。据估计，2013年的南南合作价值超过200亿美元。³⁵ 2014年的部分数据显示，南南合作的货币价值可能已远远超过2013年总值，主要原因是沙特阿拉伯大幅增加援助，在2014年将其援助增加一倍多。现有数据还显示，中国和印度提供的发展合作稳步增长。³⁶

25.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30年议程》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的通过进一步推动了南南合作势头，加速了若干主要倡议的启动。³⁷ 印度宣布今后五年为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和6亿美元赠款援助，此外还有印度在非洲的持续信贷额度方案。中国宣布设立一个20亿美元的基金，协助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并启动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26. 南方伙伴已成为日益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来源。在2015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中，阿拉伯国家约占7.4%，³⁸ 该数字可能被低估。来自南方伙伴的更高比例的人道主义援助是通过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提供的。

27. 除政府收入之外，南南合作的供资来源日益多样化。国家开发银行，包括非洲的国家开发银行在区域和次区域基础设施融资中发挥了更突出的作用。南方伙

³⁵ 本报告中的南南合作包括在南方国家之间为发展目的提供的官方优惠资源(优惠贷款、赠款以及债务减免和技术合作)，估计数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提供。见E/2014/77。

³⁶ 印度外交部和商务部。

³⁷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年发展合作论坛第12号政策简报(见脚注12)。

³⁸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财务支出核实处。

伴发起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额外资源，以资助其可持续发展需要。例如，据估计，到 2024 年，新开发银行可实现每年 34 亿美元的贷款能力，到 2034 年几乎达到 90 亿美元。³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 2016 年 1 月投入运营，预计今后 15 年将每年提供 100 亿至 150 亿美元的贷款。这两个开发银行可通过发行当地或国际货币债券利用各种来源的资源，从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筹资需要，特别是基础设施部门的需要。

28. 虽然缺乏具体数据，但上文概述的倡议显示，与气候相关的南南合作总量将继续增加。⁴⁰ 同时，气候变化已成为基础设施开发和能力建设工作的一个优先事项，这些工作仍是南南合作的主要侧重点。⁴¹

29. 总体而言，南南合作正在迅速演变，因此，南方伙伴之间更需要彼此学习和分享经验。南南合作还可以为其他行为体提供有关如何管理发展合作的有益经验教训。例如，虽然南方伙伴常常因没有对其合作进行适当评价而受批评，⁴² 印度-非洲论坛首脑会议和中非合作论坛已建立跟踪和评价机制，这些机制能够为确保履行发展合作承诺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

30. 了解南南合作的一个持续挑战是缺乏可比数据。正在重新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在发展合作论坛主持下，一些国家政府共同努力，以汇总现有做法，确定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报告南南合作方面存在的需要和差距。一个技术工作组编写了一份非正式文件，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的建议。巴西政府和伊比利亚美洲总秘书处还拟订了各项建议，以解决在认识南南合作方面所特有的方法挑战。各项建议虽有差异，却一致认为，南南合作的某些要素不适合以货币价值计算，以及此项工作的目的不是让南方伙伴承担更多义务，而是更好地了解如何通过其工作来实现更好的可持续发展成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也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和南方思想库合作，启动了这一领域的工作，民间社会组织也正在作出努力。

三. 确保发展合作更好地支持《2030 年议程》

31. 《2030 年议程》及其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基本承诺要求在恢复活力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内加强协调一致和新形式的发展合作。重点应放在最脆弱的国家和社会群体以及建设其复原力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依靠所有利益攸关

³⁹ 贸发会议：“金砖开发银行：梦想成真？”(2014 年 3 月)，可查阅：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osgdp20141_en.pdf。

⁴⁰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4 号政策简报，“让有关气候变化的发展合作响应最脆弱国家的需求”。

⁴¹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6 号政策简报，“重新设计发展合作机构，以便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⁴²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5 号政策简报，“开展新形式合作，提高协调一致性，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的贡献和适应。必须以更有成效和更高效率的方式使用资源，重点是国家和地方自主权，同时采用政治上明智的、较长期和注重成果的办法。还需要改善风险管理和问责制，使国际支助机制之间更好地协调一致。

32. 发展合作论坛为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公开交流发展合作中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机会，论坛的审议和结论能够提供关于已实现进展的资料。⁴³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确认了发展合作论坛发挥的一个具体作用，即该论坛是讨论发展合作成效问题的主要全球平台。本节审查的内容包括，为最大限度地扩大发展合作对成功落实《2030年议程》的贡献，需要哪些重要调整，以及有效发展合作的某些原则如何日益具有现实意义。

A. 调整发展合作，以实现《2030年议程》

33.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范畴内，人们期望发展合作在支持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发挥更突出和更具战略性的作用，其中包括下文概述的五个领域。每个领域对所有国家的发展合作机构调整都产生影响。

1. 使合作以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为导向

34. 预计所有国家都将根据《2030年议程》调整其国家发展合作战略，包括通过政策和体制改革这样做，并将相应地重新调整发展合作资金流向。一些国家已经启动这样的进程(见方框 3 和 4)。随着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整，发展伙伴也应作出努力，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调整其发展合作，并作出必要的相应体制调整，以提高它们的系统与发展中国家的系统之间的互通性。

方框 3：乌干达采取整体政府办法

在《2030年议程》通过后，乌干达统计局和国家规划局已设法通过一个两阶段进程整合国家发展规划和监测：

(a)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在 2015 年修订了今后五年的国家发展计划。^a 该计划提到和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

(b) 使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遵守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划局正在努力确保各部委的部门政策和预算与该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由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主导监测和评价进程。规划局认为遵守目标的部委将获得一份遵守证书。

规划局将在两年时间里进行中期审查，反映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

^a 见 <http://npa.ug/wp-content/uploads/NDPII-Final.pdf>。

⁴³ 见发展合作论坛专题讨论会摘要(见脚注 4)和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报告(见脚注 7)，第 115 页。

方框 4：使发展合作机构适应《2030 年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关键机遇和挑战之一是实现不仅更加一致、而且更加综合的政策，确保不同的政策部门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不让任何人掉队。可确定有些组织结构特点能够使发展合作机构更为有效：

(a) 强有力的任务规定，例如在瑞典，所有部委都有责任落实 2003 年通过的全球发展政策；

(b) 由内阁部长倡导发展合作能够以积极方式影响发展议程，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是这样；

(c) 支持合作管理的“整体社会”办法；

(d) 培养发展机构管理新伙伴关系的技巧和能力。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必要的调整，包括在发展合作中采取新的办法。在德国，已经设立了一些机构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合作。瑞士设立了一个内部协调小组，负责审查《2030 年议程》的挑战以及对该国组织结构和各项进程的影响。

资料来源：Gavas, M., Gulrajani, N., and Hart, T., “Designing the development agency of the futur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2015); Swiss Federal Counci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6-2019。

2. 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

35. 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⁴⁴ 应作为所需的政策和体制改革的一项总体原则被纳入。这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更好地整合政策，以促进政策空间、国家自主权和协同增效作用。发展政策的一致性旨在防止各国与发展无关的合作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意外的影响。将新的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和政策整合上能够进一步推动部门间合作和发展合作机构以外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如促贸援助倡议，通过其多层次两年期全球审查)。

3. 支持调整和加强能力

36. 发展合作可以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各个领域的政策、体制和技术能力方面发挥催化作用。⁴⁵ 其中包括开发和转让科学、技术和创新，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⁴⁶

⁴⁴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6 号政策简报(见脚注 42)，及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5 号政策简报(见脚注 43)。

⁴⁵ 见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报告，第 114-124 段。

⁴⁶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合作论坛第 8 号政策简报(见脚注 33)。

收集和管理发展合作数据；⁴⁷ 税务管理；私营部门的发展和参与；问责制框架制度化。

4. 以整体社会办法支持多方利益攸关方进程

37. 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发展合作意味着需要有效管理包容各方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不仅更加重视成果，而且更加重视联合发展进程。⁴⁸ 这需要加强公共机构的机构能力，以分享权力，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努力创造基于人权、包容、透明和问责的新参与文化。发展合作能够很好地促进利益攸关方的交流，推动参与性进程，审查证据，分享知识和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信任。

5. 加强发展合作中的多边主义

38. 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发展合作中的新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有能力承担和分散风险，侧重于长期成果和视角，不那么政治化，更具选择力、负责任和可预测。⁴⁹ 鉴于《2030 年议程》及其对发展合作的影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起了透明和包容各方的对话，讨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长期定位。⁵⁰ 对话产生的一个主要信息是，要想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更有效地支持会员国，将需要联合国系统致力于在联合分析、规划、执行、监测和审查的基础上，对日益多样化的国家优先事项和需求采取真正综合性的对策。⁵¹

B. 为实现《2030 年议程》进行有效发展合作

39. 有效发展合作原则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其执行进度却没有跟上。⁵² 本节强调在这些原则中国家自主权和协调一致原则的中心作用，说明它们如何能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得到切实实施。

40. 国家自主权要求通过涉及包括议会在内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的制度化参与性发展进程，制定、执行和监督全社会主导的国家发展计划。促进有效发展合作全球伙伴关系在其 2014 年进展报告中指出，2010 年之前在加强和利用国家系统

⁴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亚洲太平洋发展实效机制制定的发展资金评估提供了一个工具，用来核查现有的发展合作资金流动情况，以及促进关于改革的对话，这种对话可能是在国家一级加强资源、优先事项和成果之间的联系所必需的。见开发署，“加强发展合作以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发署讨论文件(2015 年 11 月)。

⁴⁸ 见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50 段。

⁴⁹ 见 Gulrajani, “Bilateral vs. multilateral aid channels: strategic choices for donors,”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report.

⁵⁰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4/14 号决议。

⁵¹ 见 A/71/63-E/2016/8, 第 304 段。

⁵² 见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58 段，以及 E/2014/77。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大部分得到了持续，但仍未达到既定目标。该报告强调需要加强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对话。⁵³

41. 外部伙伴在发展合作活动中的协调一致往往表明各国在何种程度上主导自己的发展进程。根据《2030年议程》，协调一致意味着双边和多边发展伙伴在总部和国家一级使其支助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优先事项和系统协调一致。

42. 为了加强国家自主权和协调一致，全球伙伴关系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三套政策和(或)体制改革的建议：

(a) 发展中国的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应向具体发展伙伴阐明首选方式、分工和业绩评估框架。⁵⁴ 明确的国家发展合作政策能够有效地鼓励行为变化，更好地协调资源和减少各自为政现象。关于相互问责进展情况的最新发展合作论坛调查结果也表明，对指标的监测通常能够促进伙伴国家更好地协调一致。⁵⁵ 这类政策应与国家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包括国内资源调动战略协调一致，这些计划和战略又得到《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提到的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见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9 段)支持。

- **基于方案的办法**，包括一般预算援助、指定用途的预算援助和一篮子/集合供资，是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协调和统一发展合作以及减少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⁵⁶ 自 2008 年以来(2013 年除外)一般预算援助减少的趋势⁵⁷ 加剧了各自为政现象，需要密切监测。
- **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国家成果框架，作为新的激励机制**。国家成果框架是一个重要工具，可阐明一个国家针对国家推动的目标监测和评估进展的方法。⁵⁸ 它不仅衡量成果，还衡量发展合作的长期影响，表明所有行为体应负的责任。国家成果框架应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可持续

⁵³ 可查阅：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Management/oced/development/making-development-cooperation-more-effective_9789264209305-en#page1。该伙伴关系第二轮监测结果的初步分析将于 2016 年 7 月提供，报告全文将于 2016 年 10 月其第二次高级别会议(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前提供。

⁵⁴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3 号政策简报，“处理在监测和审查国家一级发展合作方面的变化和挑战”。

⁵⁵ 2015/2016 年调查的结果将在 2016 年 7 月前提供，可查阅：www.un.org/ecosoc/en/tracking-development-cooperation，以往调查(2009、2011、2013 年)也可在该网址查阅。

⁵⁶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6 号政策简报“评估不同发展合作方式的合适程度以提高 2015 年后的成效和影响”。

⁵⁷ 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数据。

⁵⁸ 见 Elaine Venter，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1 号政策简报“推行综合、协调一致和国家驱动的成果框架以促进有效监测和审查”。

发展目标，与预算和公共财政管理进程联系在一起。发展合作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涉及多利益攸关方、包括地方政府⁵⁹ 和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参与性进程制定国家成果框架。

43. 关于有效发展合作原则如何得到实际执行并在新的和不同的背景下在实地产生可持续发展影响仍然缺乏证据。因此，发展合作应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努力共同监测和记录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调查结果，使其系统化，并向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知识交流/政策对话论坛提供反馈。发展合作论坛调查以及论坛和其筹备讨论会能很好地促进各级决策和实践之间的衔接，同时考虑到补充性的努力。

四. 通过发展合作的监测、审查和问责分享知识和相互学习

44. 2014-2016 年周期发展合作论坛关注的重点是促进相互学习和改善发展成果而对发展合作进行的全面监测、审查和问责如何能够作为《2030 年议程》及其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发挥作用。⁶⁰ 该议程认识到必须不仅注重投入，而且应特别注重成果，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包括私营部门行为体。各个层面上的努力应以相辅相成的方式一起运作，大力强调国家自主权和领导作用。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监测和审查系统以及具体的发展合作必须在所有层面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

A. 公民主导的和国家以下各级发展合作监测

45. 《2030 年议程》将人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强调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不让任何人掉队。这需要让地方一级的行为者，如社区领导人、地方和区域政治家、妇女团体及其他民间社会组织以及民众作为议程执行伙伴和受益者参与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赋予他们参与所有决策步骤(即执行、监测和评价)的权能。

1. 公民主导的发展合作监测

46. 发展合作在支持《2030 年议程》方面的成就可以通过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来衡量。因此，个人的作用对于衡量成果和影响关于未来发展合作方向的决定来说至关重要。

47. 有几个因素使以公民为基础的发展合作监测成为可能。其中包括有利的政策和立法环境，强有力的领导和随时变革的意愿，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议会，有

⁵⁹ 最新的发展合作论坛调查表明，88%的国家通过参与性进程制定了国家成果框架，同时注意到地方政府的覆盖面(63%)没有中央政府(95%)高。

⁶⁰ 见 Angela Bester, “关于为支持落实 2015 年后议程而进行发展合作监测、审查和问责的范围界定研究”,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办公室, 发展合作政策处, 2015 年 2 月)。

效的伙伴关系框架和平台，民众参与的能力，及时和易获取的信息以及权力下放的发展合作。⁶¹ 通过用户反馈机制、公民行动数据收集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模式，民众可以积极生成有价值的信息，和官方数据一起使用，以完善和补充官方数据。⁶²

2. 国家以下各级发展合作监测

48. 地方和区域政府是引导地方和国家之间信息流通的主要中介机构。它们在监测和审查发展合作方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家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能力和被赋予的权力以及中央政府分派的责任。经验表明，如果获得足够的自主权、能力和资源，地方和区域政府就能够更有效地参与监测和审查工作。⁶³

49. 在国家一级对发展合作进行的正式监测往往涉及各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地方政府的代表性较低。⁶⁴ 地方当局有效参与监测进程与其已充分参与这一进程的较早阶段(如规划和执行阶段)有很大关系，因而能够促进改进监测办法和积极的发展成果。

B. 国家对发展合作的监测

50. 在国家一级对发展合作承诺进行有效监测、审查和问责，可揭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具体情况下的发展合作挑战以及可能的根源和解决办法。此类信息有助于帮助各国加强国家发展合作框架，并为与发展合作有关的全球政策和标准制订论坛以及更广泛的《2030 年议程》相关后续行动和审查进程提供资料。⁶⁵

51. 双年度发展合作论坛调查提供有关实地发展合作现状的证据。⁶⁶ 2015 年，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开始通过多利益攸关方协商进程，更新调查的设计，目的是评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相关性日益增强的领域(如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国家发展合作政策的程度，国内资源调动在此类政策中的作用，私营和混合式发展合作)。⁶⁷ 当前第四次调查有助于各国围绕数项有效发展合作使能因素确定评估结

⁶¹ 见 Mniki-Mangaliso,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9 号政策简报，“为支持落实《2030 年议程》开展以公民为基础的发展合作监测”。权力下放从性质上看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进程，其理由、深度和成功取决于国家的情况以及规定如何在不同行政级别之间划分和协调责任的政治框架和条例。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0 号政策简报，“为《2030 年议程》使发展合作监测和审查工作本地化——前景与挑战”。

⁶² 有关评论见 Mniki-Mangaliso, 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9 号政策简报(见脚注 62)。

⁶³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10 号政策简报(见脚注 62)。

⁶⁴ 见 Bester, “范围界定研究”，(见脚注 61)。

⁶⁵ 促进有效发展合作全球伙伴关系即将提交的监测报告纳入了 10 个指标，这些指标提供信息，说明遵守有效发展合作原则(国家自主权、注重成果、包容性伙伴关系以及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进展情况。在 10 个指标中，8 个指标在国家一级监测，2 个指标依赖全球数据。监测范围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对非优惠性资金流动有重大意义的国家而言，则包括其他官方资金流动情况。

⁶⁶ 见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报告(见脚注 7)，第 77 和 78 页。

⁶⁷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6 年发展合作论坛第 3 号政策简报(见脚注 55)。

构，这些因素还可加强相互问责。⁶⁸ 它们包括：国家发展合作政策；监测框架；具有对话平台的发展合作体制架构；数据和信息；政治领导；能力建设。

52. 在第四次发展合作论坛调查结果中，为加强所有发展合作行为体的问责制，提出下列变动、挑战和提议。

(a) 目前，72%参与调查的国家拟定了国家发展合作政策。与单个发展合作伙伴的政策(54%)相比，国家发展合作政策更有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设定目标(92%)，其载列为主要提供非金融发展合作的伙伴设定的目标的可能性更小(27%)。超过半数的答复国不要求议会在通过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前举行公开听证会。总体而言，此类政策应包括坚实的成果框架和具体分工，并由议会定期审查。这些修订措施将加强相互问责和国内问责。各国政府应确保议会和民间社会充分参与进程，对人民更加负责。

(b) 81%的答复国建立了发展合作监测框架，但近一半的被调查国家仍有并行的伙伴成果框架。鼓励发展伙伴配合发展中国的政策和体系的激励措施很少。所以本报告建议，发展合作应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变革性做法，制订国家成果框架，以这种机制激励更广泛的发展合作行为体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合作，产生更长期的影响(见第三节)。

(c) 86%的国家建立了对话的体制架构，如国家发展合作论坛。这些架构被认为可以增添价值，建立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信任，推动发展合作谈判，使发展合作配合国家决策，促进共享知识和相互学习。与地方政府或私人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的贡献相比，国家发展合作论坛往往对部委和双边伙伴的贡献进行更多审查。必须投资加强发展中国的机构能力，使它们能够筹备和举办国家发展合作论坛，对论坛采取后续行动，并发现创造性办法，吸引相关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参加。除此之外，必须努力解决对发展合作行为体、特别是议员和民间社会组织能力支助不足的问题，这仍是阻碍在国家一级对发展合作开展综合监测、审查和问责的障碍。

(d) 发展中国家收集、分析和综合决策数据的能力有限，增加的报告负担加剧了这种情况。发展合作论坛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信息系统中只有47%使用国家预算编码，发展伙伴的预算编码中只有33%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信息系统相一致。必须确定办法，有效激励发展伙伴并使它们能够使用国家系统，并支持发展中国家政府改进发展合作信息系统，以期加强系统同发展中国家及其外部伙伴的预算流程的互通性。为提高发展合作数据的质量和可获性，正在开展国际援助透明化倡议、开放式政府伙伴关系、国际预算伙伴关系等工作。

53. 此外，应努力获取透明和有效的涉及私营实体的发展合作数据，更好地衡量此类合作的实效和影响。这将支持更好的决策和参与；鼓励最佳作法、相互学习

⁶⁸ 在2015/2016年度调查中，84个目标国中有58个国家参加，其中一半是最不发达国家。

和共享知识；并有助于推动持续提高可持续发展资源的数量、质量和针对性。应采用更加全球化的多利益攸关方联合方法来评估涉及私营部门和混合发展合作的影响和实效。

C. 区域和全球对发展合作的监测和审查

54. 虽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行动，但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大部分目标和具体目标。区域和全球两级的后续行动和审查进程应相辅相成，必须补充并支持国家和地方的审查，最终目标是加快实现消除贫穷和饥饿以及其他目标的进展。⁶⁹

55. 国家监测和审查的结果应纳入区域监测和相互审查进程并从中受益，这些进程可提供平台，确定参与国的能力建设需求以及共享知识、相互学习和交流技术的机会。区域委员会可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信息交流和相互审查。⁷⁰ 非洲联盟-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非洲同侪审议机制、关于加强太平洋地区发展协调的凯恩斯契约以及加勒比共同体也是区域监测和审查机制的知名例子。本次发展合作论坛调查及先前的调查(2013 年度以及 2015/2016 年度调查)显示，95%的国家表示它们已经利用区域和全球监测机制的调查结果来审查发展合作趋势。

5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的 2016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作为全球核心审查平台，预计将以全面方式审查执行情况。论坛评估进展、成就和所有国家面临的挑战，确保《2030 年议程》继续具有相关性和宏伟目标。

5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论坛将审查《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执行情况以及《2030 年议程》执行手段的提供情况。发展合作论坛侧重于发展合作作为落实《2030 年议程》的整合力量发挥的关键作用。其工作为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进程提供资料，并促进执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高级别政治论坛在审查实现《2030 年议程》的进展时，考虑到发展合作论坛的工作。发展合作论坛确定阻碍伙伴关系取得成功的差距，帮助设计并执行监测和审查机制，评估各种工具的有效性。发展合作论坛调查反映了各国在发展合作的质量、影响和实效方面取得的进展。

58. 在全球层面，今后的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也可审查在有效支助会员国落实《2030 年议程》方面的全系统业绩。

五. 主要建议和结论

59. 发展合作作为有效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手段，拥有巨大潜力。它包括广泛的国际行动，采用资金、能力建设、技术开发和转让、政策变化和和

⁶⁹ 见秘书长关于在全球统一开展高效和包容的后续落实和审查工作的关键节点的报告(A/70/684)。

⁷⁰ 见区域委员会文件，“对《2030 年议程》后续行动和审查框架的区域思考”，可查阅：www.regionalcommissions.org/FUR2015.pdf。

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等各种方式。发展合作仍应紧密着眼于发展中国家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把“不让任何人掉队”作为基本关切，并特别关注最脆弱的国家和群体。有效的发展合作可帮助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的深刻政策和方案整合，促进包容性跨部门伙伴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一致性提供能力支助。

60. 《2030年议程》应进一步推动所有发展合作行为体改变心态。需要采取个别行动和联合行动，克服阻碍采取更加一致和综合性对策的“筒仓式”心态，调整各级的发展合作机构。全球机构应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调整自己的轻重缓急、整体战略、业务工作方法、资金和能力。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展合作应发挥更加突出的战略性作用，支助所有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并更加注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这将需要特别注意填补这一领域的巨大数据差距，提高发展合作分类数据的质量和可获性。

61. 官方发展援助仍是发展合作独特而重要的驱动因素，现有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必须兑现。应进一步把官方发展援助作为优先重点并加以更好利用，以主要针对赤贫人群和能力最弱的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可针对特定需求领域，并惠及最贫穷和最弱势的人群，它应被用来解决冲突的根源。

62. 在调动国内资源、加强统计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动员公私合作等方面，官方发展援助也可成为一个重要的杠杆工具。然而，需要密切监测证据，了解使用官方发展援助促进调动其他资源的不同方式的实效。参与发展合作的私营实体应公布更多更好的信息，说明其合作的实效和影响以及评估方法。混合融资应调动更多私人资金流，支助国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63. 应研究南南合作新举措及其后续行动和评价机制，为其他行为体总结管理发展合作途径的有益经验。应在联合国支持下，继续努力更好地了解如何从南南合作中实现更好的可持续发展成果。发展合作(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应发挥更突出的作用，释放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变革力量。

64. 实现真正的国家自主权和一致性需要所有国家的合作框架和流程发生显著转变。发展合作应特别支持发展中国家拟订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基于方案的方法和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成果框架，以使发展影响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65. 各国政府、地方政府、议会、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民共同负责监测并审查实现发展合作承诺的进展，并特别关注共享知识和相互学习，以实现更好的发展成果。应进一步强化政府对人民的责任。鉴于《2030年议程》的广度和复杂性，必须逐步增加资源，以在有效的全球和区域后续行动和审查机制支持下，对发展合作承诺开展强有力的国家和地方的监测和审查。